



灵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

LINGYUNYUJIUSHU — BENYAMINGSIXIANGYANJIU

本书借着对本雅明提出的“灵韵”、“紧急状态”、“国家大计”等诸范畴的考述，把充满歧义与内在扞格的本雅明思想阐释为一个线索清晰、略可予以整体把握的系统。



作者对本雅明致思初衷的探问是真切而富于同情理解的，对其理论得失的检讨颇具分寸感而又有相当的深度。对多个“双重的本雅明”——卡夫卡式的本雅明与波德莱尔式的本雅明或布莱希特式的本雅明与阿多诺式的本雅明——所体现的某种时代悲情和精神张力的揭示是本书最见特色之处。

于闽梅◇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丛书主编 / 查振科

灵韵与救赎 —— 本雅明思想研究

LINGYUNYUJIUSHU — BENYAMINGSIXIANGYANJIU

于闽梅◇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于闽梅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6
ISBN 978 - 7 - 5039 - 3531 - 2

I. 灵… II. 于… III. 本雅明, W. (1892 ~ 1940)
—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5072 号

灵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

著 者 于闽梅

责任编辑 金 燕

责任校对 崔建文

封面制作 雪 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 whyscbs. com](http://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 net](mailto: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531 - 2/G · 727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录

引言	“紧急状态”及其应对	1
第一章	作为“非宗教时代”的现代	13
一、“大众”	: 现代社会的新的人群	16
二、现代社会	的个体危机: 丧失“经验”与转向内心	21
三、非宗教时代	与“弥塞亚”的意义	35
第二章	灵韵消逝	43
一、灵韵	——信仰时代的价值之光	46
二、灵韵消逝	: 由“礼仪”到“政治”	50
三、现代“灵韵”	: “商品的光环”	56
四、现代“灵韵”	: “灵韵的借用”	61
第三章	权宜之计: 放弃灵韵	67
一、“阿本之争”	: 从旧的好东西还是从新的坏东西出发	71
二、艺术批评家	(知识分子) 的战略任务: 毁坏作品	83
第四章	个体应对: 重返“灵韵”	93
一、“善变”	的波德莱尔	97
二、“失败的”	卡夫卡	112

第五章 总体应对：“国家大计”	135
一、“进步的概念必须以灾难的观念为基础” ——本雅明对现代性的反思	138
二、寓言作为救赎：德国悲悼剧研究	145
三、“国家大计”：《巴黎拱廊街研究》	160
 结语 本雅明思想的意义与中国当前文化现状	175
一、更新传统，灵韵再现	177
二、中国的文化现状：意义缺失的大众化时代的艺术	183
三、本雅明的思想资源与中国当前文化现状	190
 主要参考文献	200
 后记	216

[引言]

“紧急状态”及其应对

我无法对危险的局势视而不见。

——本雅明^①

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广义上的“现代”时期。^②与此相应的则是“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是一个关于“现代”的问题，是关于“现代”的叙事；就字面意义而言，它是指“现代的性质或状态（the state or quality of being modern）”。^③目前学术界对“现代性”达成的大致共识是：现代性是指欧洲中世纪结束文艺复兴开始以来，尤其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性状。^④由此可见，在广泛的意义上，现代性不仅代表一段历史过程，代表着启蒙时代以来人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转变，它还代表了一种不断改造世界的内在要求。就狭义而言，现代性是以工业文明（技术与科学等的发展）为标志的，包括人在

①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1910 - 1940*, ed. by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 Trans. by Manfred R. Jacobson and Evelyn M. Jacobs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638.

② 现代，Modern，拉丁文为 modo，意指“刚才”，是一个时间概念。

③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Harlow and London: Longman Roup Limiter, 1978, p. 700.

④ 特洛尔奇对于启蒙运动的时间定位是被广泛认可的。他认为“启蒙运动的基础在17世纪以及更往前的文艺复兴，其繁盛期在18世纪，衰落于19世纪”。美国宗教哲学家路易·迪普雷（Louis Dupre）也认为：现代性产生于中世纪后期神学的各种思潮以及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现代性的种子在14世纪后期就已埋下，指的是人的精神范畴和主体性觉醒。德国思想家特洛尔奇认为现代起源于13、14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以上引文均参见刘晓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75页。

「人文博士论坛」——灵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

内的整个文明结构的重新调整和塑造。

康德（1724—1804）哲学可谓是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性”的一次深刻总结。康德把理性视为自然和道德的立法者：“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利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①可见，康德这里所谓的现代性，是一个偏向以理性和启蒙为旨归的现代性。但康德对现代性的两个基本信念——理性与进步——作了有保留的限定，为后代哲学家讨论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发展和批判的余地。

在纵向的历史坐标上，存在着一个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传统性/古典性）的决裂，决裂的依据正是启蒙运动所标榜的理性至上、科学万能、平等自由等思想原则与进步进化、功利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马克思在谈到亚洲解体的时候，曾经论及这种决裂的依据：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光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②

马克思承认：一方面，前现代性那田园诗般的典雅和宁静，令人在情感上无限依恋，但另一方面，自由与理性是告别这种田园情怀的最高价值

① [德]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页。

② [德]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68页。

所在。从摆脱专制、迷信、传统规则这一角度而言，决不能留恋前现代性所呈现的和谐。但是，马克思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的话语也形成了启蒙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这样的话语也导致现代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构成了一个具有特权的分析领域，成为福柯所谓的对人的一种“敲诈”，所谓“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都构成这些话语的一部分。这就导致现代性内部的“情景化叙事”出现了断裂：

要确切地说出何时人们可以谈论两种不同的且尖锐冲突的现代性的出现，是不可能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不可弥合的两种现代性的分裂，一种是作为西方文明史中某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席卷经济和社会领域变革的产物；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从那时以来，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敌对，尽管在彼此要竭尽全力战胜对方的过程中并不认可彼此的影响，却也激励相互之间影响。^①

可见，这种非一致性的要点在于：1. 从历史的角度看，19世纪上半叶，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开始反对启蒙现代性，两种现代性关系越来越敌对。2. 这种断裂造成了现代性内部的思想文化冲突，冲突表现在以理性、进步为价值诉求的启蒙主义和以审美、自由为诉求的现代主义之间。就这种分裂的哲学背景而言，康德之后现代性的传统在哲学上呈现为两种动态结构。一是黑格尔将理性绝对化，提出“绝对理念”，理性获得了空前的和永久的自由，理性是自律的、自思的，是一切目的的目的，也是趋向目的的动力，一切都是理性的外现和展开。黑格尔哲学与启蒙精神始终联系在一起，并与世俗化过程密切相关；二是尼采（F. Nietzsche, 1844 - 1900）对理性的反思，他批判了以理性替代宗教的启蒙哲学思路，尼采批判柏拉图以来西方对理性价值和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的过分推崇与

^①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ru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41 - 42.

「人文博士论丛」——灵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

强调。尼采指出：只有艺术的超历史力量——而不是理性——才可以填补“上帝已死”之后的真空，应该以艺术取代传统宗教的力量。

在社会学意义上，现代性的两大特征诚如韦伯（Max Weber, 1864 - 1920）所言，是解魅与启蒙。韦伯看到，理性化的趋势已经成为启蒙之后西方的意识形态了。启蒙主义与审美主义之间的这种并存而又对抗的情势，说明了现代性存在着非一致性，是一个包含着相反命题的悖论：

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就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①

在艺术上，审美主义遵循一种尼采式的反理性精神，并以反理性精神构成了审视现代的批判视角，为了达到有效的批判，有时甚至需要把古代的亡灵（前现代性）重新拉出坟墓来“解‘解魅’”。这种非理性、反理性的精神隐含着—个否定的逻辑：对过去的追思就是对现时的否定。但是这种“解‘解魅’”的反抗要面对双重的敌人：一个是以“科学”面目出现的专制理性，另一个则是他们从坟墓里拉出的“亡灵”（前现代性），审美主义并不是真正要复活它，而只是借助它来反抗启蒙桎梏。他们不得不借助非理性、超理性的力量，虽然他们本身时常怀疑这种力量。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 - 1940）面对的也是这样的双重敌对力量。他于1892年7月15日出生于柏林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早年在哲学和历史学方面深受德国传统文化熏陶。本雅明的青少年时代正值进步与科学价值在欧洲乃至世界的乐观时期，也正值德意志帝国鼎盛时期。1871年，德国在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推动下实现了统一，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飞速、全面增长的时期。到1891年的20年间，德国的铁产量从156万吨增加到464万吨，增长了3倍多；钢产量从25万吨增加到235万吨，增长近10倍；煤产量由379万吨增加到942万吨；铁路里程也比以前扩展了一倍多。在许多重要的经济指标上，德国已经超过

^①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91, p. 10.

了法国、英国，仅次于美国。在电气、化学和光学等当时的新兴产业中，德国的表现尤其突出，显示出咄咄逼人的势头。20世纪初，德国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大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

本雅明的青少年时期，也正值反启蒙思想初露端倪之际。反启蒙反的不是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而是针对这一传统在19世纪的变形化身——实证主义崇拜。反启蒙思想表现为以新浪漫主义或新神秘主义反对实证主义，提倡后者所反对的“想象力的价值”。在德国，尼采主义、新康德主义等盛行于世，本雅明深受乐观主义的影响，热衷宣扬教育改革、社会进步等思想，并投身于新浪漫主义的“青年运动”。

但是，一次世界大战很快使他的梦想烟消云散。在这之前，不仅是德国，整个西方社会都陷入到一种乐观主义中。1870年到1914年是物质主义时代，欧洲的主要国家已经统一起来，这是一个政治稳定而物质进步惊人的时代，是一个公认的“黄金时代”。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深入人心，人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会带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可惜，“1914年8月粉碎了那个人类世界的基石。它揭露出，社会表面上的稳定、安全以及物质进步，跟所有人类的事物一样，都只是海市蜃楼。”^①

黄克剑老师与我谈及西方19世纪中后期的文化危机时说：“在19世纪初已略见端倪的西方文化危机是以功利为主导价值取向的近代人逞欲操作认知理性的结果，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光华炫目的文明成就对文明成就者的蔑弃。”

“一战”后，西方这个“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不但未出现启蒙理性预想的乐观景面，反而出现了理性桎梏、物欲膨胀、道德沦丧、发展过度等各种问题，使得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等基本关系都发生严重的扭曲和异化。启蒙理性由价值理论渐次沦落为量化、形式与功能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工具理性日渐君临于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所宣扬的自由之上，成为原先启蒙理性所批判的

^① [美] 威廉·白瑞德：《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探源》，彭镜禧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人文博士论丛——灵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

那种集权主义的胁从者。

西方自 1914 年以来发生的变化^①，本雅明以之为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很清楚，在经历过 1914—1918 年的这一代人身上，经验贬值了，这是世界史上一次最重大的经历。”^②显然，本雅明是从“经验”角度来观察、论述这次转变的。本雅明渐渐由浪漫主义转向救世论的社会主义，同时的卢卡契、布洛赫也于此时发生了类似的向“左的伦理学与右的认识论的结合”^③的转变。由于经验贬值，人的性质也改变了，前一代人的经验在他们眼中失去了价值。他们眼中的世界变了样，整个世界陷入一种精神危机之中。这场精神危机在 30 年代登峰造极，人们期待着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以缓解这场精神危机，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都在谈论革命。在欧洲以及北美，30 年代的所有知识分子都转向政治生活的边缘以寻找能够改变现实的途径。

这就是本雅明所形容的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启蒙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和恐怖，人类发现自己陷入了“恐怖与文明不可分离”的状态。在广义上，紧急状态可以用来形容现代性的一系列危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价值体系的全面颠覆，它使所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处于普遍失范状态。在紧急状态中，个人、组织的行为几乎完全失去了可预测性。质言之，“紧急状态”的提出，意

① 一些人也把 1914 年看成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晚期现代性）的历史分期。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现代性是与古典性（前现代性）相对的一个说法；从认识论角度而言，现代性的核心是总体性和同一性，而一直有争议的后现代性则更强调局部性和差异性。就对理性化的抵制而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差异。所以安东尼·吉登斯等人宁愿使用“晚期现代性”也不愿使用“后现代性”。现代性常常与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总体论、同质论、反映论等连在一起，后现代性则常常与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差异论、异质论、解构论等相关联。但是，对现代性的论述多不从这个有争议的认识论角度，而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

② [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见《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2 页。

③ [匈牙利]卢卡契：《小说理论》，杨恒达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13 页。

意味着现代人对存在状况激变的最基本最紧迫的感知。本雅明所写的全部文字^①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谓“紧急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我们必须具有一个同这一观察相一致的历史概念。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任务是带来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从而改善我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法西斯主义之所以有机可乘，原因之一是它的对手在进步的名义下把它看成一种历史的常态。我们对正在经历的事情在 20 世纪“还”会发生感到惊诧，然而这种惊诧并不包含哲理，因为它不是认识的开端，它还没有认识到它由以产生的历史观本身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哲学论纲之八）^②

紧急状态及其应对，是本雅明理论的出发点及根本所在。就历史哲学角度而言，紧急状态并非传统中的“例外”，而是“常规”。所谓的“例外”在于我们以什么方式来对待这种“常规”。是听之任之在人类历史中一再发生，还是面对它？我认为：“紧急状态”是包括影响与反应在内的两种状态：一是外部世界的紧急状态，这是由现代性全面生成和普遍扩散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问题造成的，这些问题的爆发导致了无法避免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危机；二是身处其中的人们认识并感知到这种紧张而产生了

① 本雅明一生的著述大致包括：《论总体语言和人的语言》（1916 年）、《未来哲学纲要》（1918 年）、《德国浪漫主义中的艺术批评概念》（1920 年）、《神学——政治片断》（1920—1921 年）、《暴力批判》（1920—1921 年）、《翻译者的任务》（1921 年）、《论〈亲和力〉》（1921—1922 年）、《德国悲剧的起源》（1924—1925 年）、《单向街》（1925 年）、《莫斯科日记》（1926—1927 年）、《超现实主义》（1928 年）、《卡尔·克劳斯》（1930—1931 年）、《什么是史诗剧》（1931 年）、《柏林纪事》（1932 年）、《弗朗茨·卡夫卡》（1934 年）、《作为生产者的作者》（1934 年）、《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5 年）、《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1936 年）、《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1937 年）、《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1938 年）、《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1939）、《历史哲学论纲》（1940 年）等，还有一些译著。

②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 trans. by Harry zohn. london: Fontana, 1992. p. 257.

「人文博士论丛」——灵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

一种内在的精神紧张状态，这是对外部紧张的一种回应，更是一种强化。

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如何对待现代性紧急状态（现代社会和艺术的危机），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发生了争执。争执是从 1935 年开始的，这一年离本雅明后来在西班牙边境自杀只有不到五年的时间。表面上，本雅明的论争对手是他的朋友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而实际上阿多诺并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这场论争的实质是本雅明与整个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之间的冲突。第一次论争是由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街计划的写作提纲《巴黎：19 世纪的都城》（1935 年）引起的；第二次论争最激烈，是随着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 年）的公开发表而发生的；第三次论争的导火索则是他的文稿《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1938 年），这篇具有独创性的论文被认为把“上层建筑”与“经验基础”中的因素“直接地”，“可能甚至是随意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研究所的杂志，还是他死后 1955 年阿多诺为他出的二卷本文集，都没有刊印这篇文章。由此可见，“阿本之争”（The Adorno - Benjamin Debate）甚至持续到本雅明去世之后。这一场争执发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代表阿多诺和本雅明之间，并由此开启了西方现今两条对文化研究和现代文明完全不同的路径：社会批判派（阿多诺 - 哈贝马斯 - 詹姆逊）与纯文化研究（本雅明 - 恩森斯伯格 - 麦克卢汉）。

“本阿之争”背后隐藏的重大问题是：人类进入了新一轮的“紧张状态”，应当如何看待这种状态？如何最有效地应对这种状态？如何确立基本思想和认识论共识？如何区分这种共识与现实应对的区别？本雅明的结论与其他思想家有着怎样的不同？他深刻的洞察力体现在何处？本雅明艺术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当前文化危机及其应对提供了怎样的思路？站在今天的我们如何看待、如何借鉴思想资源并以之有效地应对当下危机？这些思想资源对于挽救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危机和价值失重具有怎样深远的意义？

为解答这些重大问题，首先，须追溯本雅明不同阶段理论转向发生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动因，尤其须联系 20 世纪人类的光荣（科学技术的长足进展）与灾难（政治极权主义、战争等等）来探求本雅明思想的意义。其次，通过古典精神与现代精神的比较，我也试图描述本雅明流动、

变易和差异的思想冒险，揭示本雅明“弥赛亚”精神的基本特征，描述救赎理论重要转变发生的契机——机械时代的革命性及其限度等。再次，通过对本雅明精神履历、思想转化和哲学建树的研究，本书意在集中分析本雅明的“灵韵”、“悲悼剧”等富有伦理意味的哲学概念，揭示这些概念的含义及其所蕴含的基本问题。最后，诚如哈贝马斯在《启蒙批判还是救赎批判》一文中所断言的：“即使在最通常的意义上，本雅明也是重要的，他是当代思想史的分界点。”哈贝马斯于1985年发表《现代性哲学话语》，认为本雅明于现代性研究有开创之功，“在现代中寻找现代的根基，并将新意识引入美学批评”^①。为理解本雅明思想作为当代思想史“分界点”的意义，本书还将追溯哲学的历史，通过再现本雅明与古典思想家的对话，揭示当代思想史转折的契机，探知本雅明思想之宗趣所在。

^①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 7.

